

世系谱牒与族群认同

张全海 著

SHIXI PUDIE YU
ZUQUN RENTONG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世系谱牒与族群认同

张全海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系谱牒与族群认同/张全海著. —上海: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 12

ISBN 978-7-5100-3153-3

I. ①世… II. ①张… III. ①谱系学—研究—中国
IV. ①K8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3330 号

世系谱牒与族群认同

张全海 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广中路 88 号

邮政编码 200083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竟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质检科电话: 021-5539177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7 字数: 200 000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3153-3/G·274

定价: 25.00 元

<http://www.wpcsh.com.cn>

<http://www.wpcsh.com>

序

“我们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已经成为历代先贤争先恐后的命题，也是后世精英前仆后继的理由。在这个关系人类根本的想法中，哲学家看到了哲学，历史学家看到历史，王侯们看到了自己血脉，成功人士看到了自己的发家历程。非常可惜的是，他们看到的東西很可能只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而产生的幻想，因为在那些“盗梦空间”里到处都写着三个清楚的大字——不靠谱。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不靠谱”事情，就是因为有所谓“谱”或者“靠谱”的东西存在。就像美女可以从镜子中发现自己日渐憔悴、照妖镜可以使妖精现形一样，一些“靠谱”或者被称为“谱”的镜子也可以照出那些“不靠谱”的事情。在我的眼里，张全海博士就是千千万万磨制“照妖镜”的一员。张全海博士集十余年之功，全面考察了学界涉及谱牒(学)的问题，遍及谱牒发展史、谱牒学史、谱牒的体例、谱牒的版本目录、谱牒的价值、谱牒的个案与专题研究(包括少数民族谱牒、地区谱牒、名人家谱、各姓族谱、华侨谱牒等)。

更为可贵的是，张全海博士与那些呆坐书斋的所谓“大师”不同，他不仅仅是一位谱牒的研究者，还是一位谱牒编修的参与者和实践者。他曾经于上世纪90年代参与了他们家族的家谱续修活动，包括执笔编辑谱稿、赴异地寻访宗亲等。在其后的三四年里，人们也许曾经看到一个“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地方有关姓氏谱牒的资料，采访周边姓氏，把一些口传资料记录下来，查看各姓家谱时把感兴趣的内容抄录下来，如有书籍报刊载有相关内容，或剪辑或抄记，总之在条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搜集可以看到听到的资料”的人，那个人就是张全海博士。为此，他曾经被渴望见到自己族谱的人奉若神明，也屡屡遭到一些不明事理之徒的白眼。但不论怎样，在那个通讯技术、照录技术欠发达的年代，从事田野调查和文献采集工作的难度不会亚于攀爬世界屋脊。

《世系谱牒与族群认同》就是张全海博士体力和智力结晶。限于出版专著的篇幅，文中只是选取了民族(满洲)、宗族(义门陈氏)和移民(古代中国向朝鲜半岛的移民)三个族群作为研究对象，来考察世系谱牒在族群认同过程中的角色问题。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可以从作者雄厚的文化底蕴、熟练的文字处理和规范的文献使用中领略到中国学术的希望。

作为《世系谱牒与族群认同》的第一读者，我最后想说的是，在一个丰满的事实面前任何的语言评价都会失去光彩，在一部重要的专著面前任何读者都能够汲取自己的有益成分。因此，还是请大家亲自去体会和尝试“开卷有益”吧！

张全海

中文摘要

作者根据自己参与修谱活动的经历及十几年来对谱牒(学)研究的关注,感悟出谱牒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一感悟放到谱牒学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视阈中加以考察,从而确定了“世系谱牒与族群认同”这一选题。文章选取民族(满洲)、宗族(义门陈氏)和移民(古代中国向朝鲜半岛的移民)三个族群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及历史文献考据法等手段,考察世系谱牒在这三个族群认同过程中的角色问题。

经过作者的分析论证,文章最后认为,世系谱牒在族群认同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由此,作者得出三点结论与提示:第一,谱牒不仅具备学界常说的史料文献价值,它还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族群心理认同问题上有着值得重视的价值,学界应在这方面做出更多的探索;第二,谱牒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祖先信仰的一种具体形式,祖先认同心理经过正确的引导可以上升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不应该妖魔化宗族文化及谱牒文化;第三,谱牒学界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拓展学科视野,引入新的工具体系,社会文化人类学界也可更多地关注谱牒在民族国家认同中的价值,研究谱牒文化在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及海外华人圈中祖国认同感等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 谱牒;族群认同;满洲;义门陈氏;明朝遗民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compiling family tree and continuous study on genealogy for over ten years, the author recognizes that there is som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alogy and ethnic identity and tries to explore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disciplines consisting of genea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and ethnology. So the topic of the dissertation, Genealogy and Ethnic Identity, is formed. The author chooses three kinds of ethnic groups as research objects in this dissertation, which are nation (manchu), clan (Righteous Family Chen) and immigrant (immigrants in Korean Peninsula from ancient China), and comprehensively uses methods of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investigate what role genealogical records play in ethnic identity of these ethnic groups. Through analysis and argumentation, this dissertation finally presents that genealogical recor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thnic identity.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have been drawn: First, genealogical records not only have documentary value as historical materials, which are usually mentioned by scholars, but also have important value of ethnic identity as a cultural symbol, which scholars should study more. Second, genealogy culture is a concrete form of ancestor worship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an appropriate guide, ancestor identification could be transformed to nation-state identification, so clan culture and genealogy culture should not be distorted. Third, genealogy researchers should expand disciplinary view in future study and adopt new research methods, while the researchers of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genealogical value on nation-state identification and explore genealogical value in strengthening Chinese Nation's cohesion and overseas Chinese's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Keywords: Genealogy; Ethnic Identity; Manchu; Righteous Family Chen; Ming Dynasty Adherents

目 录

1 绪论：集十年之功汇成一帙	(1)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
1.2 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现状评述	(5)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9)
1.4 创新、不足与展望	(11)
2 世系谱牒与民族认同的建构——以满洲(族)为例	(13)
2.1 背景：华夷之辨与大一统	(15)
2.1.1 阎崇年的案例	(15)
2.1.2 雍正与《大义觉迷录》	(18)
2.2 过程：祖源传说与谱系的构建	(21)
2.2.1 族源传说的编织	(22)
2.2.2 满洲谱系的构建	(27)
2.3 变迁：从满洲到满族	(29)
2.3.1 满洲认同的危机	(29)
2.3.2 谱牒在民族认同重建过程中的角色	(31)
3 族谱：维系宗族认同的根脉——义门陈氏的千年实践	(35)
3.1 累世同居共财的义门宗族	(36)
3.1.1 宋代义门宗族简况	(37)
3.1.2 宋代学者们的探索	(38)
3.2 江州义门陈氏的同居共爨与“奉文改谱”	(41)
3.2.1 义门陈氏及其族谱	(41)
3.2.2 “奉文改谱”的困惑	(46)
3.3 “奉诏分庄”与族裔认同历程	(51)
3.3.1 “奉诏分庄”的经过	(51)
3.3.2 义门族裔的认同历程	(53)

4 移民,寻根,修谱——朝鲜半岛的“游子情”	(57)
4.1 朝鲜半岛历史上的中国移民	(58)
4.2 移民及其后裔的怀祖、寻根与修谱	(63)
4.2.1 移民们追怀祖先谱系	(63)
4.2.2 移民后裔的寻根与修谱	(65)
4.3 韩籍华裔的寻根之旅	(69)
4.3.1 韩籍华裔的现代寻根之旅	(69)
4.3.2 谱牒之于移民心理认同价值的浮现	(74)
5 余论:谱牒还有什么意义	(77)
参考文献	(83)
后记	(103)

1 绪论：集十年之功汇成一帙

十二年前，第一次翻开家谱，从那时起，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将要把十二年来的搜集与思索汇成一帙，不禁心潮澎湃。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1997—1998年，我参与了本族的家谱续修活动，任务是负责执笔编辑谱稿，并参与外地宗亲寻访工作，由此幸运地接受了一次社会文化人类学与历史文献学的“民间训练”，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谱牒之学。在老家工作的那三四年的时间里，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地方有关姓氏谱牒的资料，采访周边姓氏，把一些口传资料记录下来，查看各姓家谱时把感兴趣的内容抄录下来，如有书籍报刊载有相关内容，或剪辑或抄记，总之在条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搜集可以看到听到的资料。那时候通讯技术、照相机、录音机和复印机都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做田野调查和文献采集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2001—2004年，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原打算以谱牒作为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范围，但当时由于眼光仅限于谱牒本身，考虑到关于谱牒的发展历史、编修体例、史料价值及个案研究已经有了很丰富的前人成果，不需要我再画蛇添足了，所以后来选择了另外一个比较熟悉的领域——武举人物研究（当然其中有谱牒的元素参与）。毕业之后虽然去了企业，做着与科研学术不大相干的事情，但没有在谱牒之学上著成论文的遗憾时常不能挥去。

2007年再度回到学校之初，我即再次确定谱牒作为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不过这一次我已有了新的感悟，近年由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资源的丰富已经远远超出了十年前的想象，除了能更方便地获取资料外，网络即时通讯工具及电子邮箱给人们之间的交流形式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在网上能够与世界各地谱牒爱好者进行便捷的交流，在通畅的交流过程中往往能捕捉、汇集诸多的灵感火花，就这样，我开始领悟出，谱牒的价值并非仅仅在于其本身（如史料价值），附着在其上的意义远不止这些。反思回味先前多年与谱牒相交的经历，我逐渐明了，为什么包括我自己在内，那么多人心甘情愿不求回报地投入宗族文化活动及谱牒的编修与研究？这其中并没有什么经济利益的驱动，更不涉及权势的争取问题，而让人感到最浓烈的是一种心理上的诉求与满足，当你在泛黄的家谱上看到从未谋面的祖辈名讳，当你在他乡找到跟你姓名前两个字都一样

的同辈宗亲,那时候的心理感受是最强烈的。先前更多的只是一种体验,这时我开始转入对这种心理感受的自觉探索,在意识转换之后,我慢慢发现这是一种属于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范畴的东西,宗族可以算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族群,而这种强烈的感受则可以理解为人们对于历史的归属感和心理上的认同感。当把这一想法与朋友们交换意见时,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在我的脑海里,为谱牒打开了一扇通往新领域的大门,那就是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交织在一起的广阔视野。

从手抄笔录、胶片照相机、卡带录音机、纸质书信,到扫描复印、数码相机、数码录音笔、电子邮箱,乃至互联网搜索引擎、各种学术期刊图书数据库,这是一个艰辛而又不断让人感奋的变化历程。就这样,我一步步将选题初步定位在谱牒与族群认同这个方向上。

然而,这仅仅是从自身的经验与主观意识角度出发作出的判断,还没有将这个命题用严谨的学术方法来进行权衡。如果说要将这一认识放到学术氛围中加以考量的话,那么首先是谱牒学本身,目前在中国主要是由图书馆学、社会学及史学界的少数学者们在研究;其次是关于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问题,在国内外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中有较为广泛的研究。

全面考察目前学界对于谱牒(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谱牒发展史、谱牒学史、谱牒的体例、谱牒的版本目录、谱牒的价值、谱牒的个案与专题研究(如少数民族谱牒、地区谱牒、名人家谱、各姓族谱、华侨谱牒等)等等。结合著述发表形式,我试将其按以下分类举要介绍。

通论类书籍:(日本)多贺秋五郎《宗谱の研究(资料篇)》(1960年)及《宗谱の研究(研究篇)》(1981年)、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1971年)、来新夏和徐建华《中国的年谱与家谱》(1991年)、欧阳宗书《中国家谱》(1993年)、徐建华《中国的家谱》(2002年)、吴强华《家谱》(2006年)等,不包括含有专论谱牒的章节这类的书籍。

通论类文章:潘光旦《中国家谱学史略》(1929年)、杨殿珣《中国家谱通论》(1941—1945年)、杨廷福《中国谱牒学的源流》(1980年)、刘光禄《谱牒述略》(1981年)、武新立《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1988年)、袁俐《谱牒学》(1996年)、胡锦涛和胡哲《中国姓氏谱牒源流述略》(1996年)等。

谱牒的价值类文章:潘光旦《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1947年)、武新立《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1988年)、冯尔康《家谱的学术价值及其研究的现实意义》(1989年)、葛剑雄《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1997年)、仓修良《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1997年)、邓达宏《华侨谱牒的档案价值》(2003年)、徐建华《家谱的地方性特色及价值》(2005年)等。

对待谱牒本身的态度类文章:白钢《要重视谱牒学的研究》(1985年)、徐扬杰《当前农村的家族活动和我们应取的态度》(1991年)及《当前农村的家族活动及其出路》(1996年)、黄永年《也谈家谱》(2001年)、彭友茂《“家谱热”的冷思考》(2005年)、余金养《谈对族谱的“正名”》(2007年)等。

文集类:中国谱牒学研究会《谱牒学研究 第1—4辑》(1989—1995年),(中国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中英文版(第1—7届各分册,1984—1996年),上海图书馆《中国谱牒研究》(1999年),上海图书馆《中华谱牒研究》(2000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谱牒学论丛 第1—2辑》(2006—2007年),萧国健和萧国钧《族

谱与香港地方史研究》(1982年),孙定朝、孙建朝和孙昊《家谱研究管窥》(1998年),王鹤鸣《解冻家谱文化》(2002年),张海瀛《族谱姓氏研究集》(2003年),沙其敏和钱正民《中国族谱地方志研究》(2003年)等等。

至于谱牒断代研究、谱牒的体例、谱牒的版本目录、谱牒的个案与专题研究等与本文相关度不高的几个方面,这里就不予介绍了。

在以上我所列举的谱牒研究论著中,基本没有专门论及谱牒与族群认同方面的论文或书籍的章节。而目前我所发现的少数涉及这个问题的文章或书籍将在本章后文的文献综述中予以论述。

族群认同问题是国内外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在探讨民族、民系、移民、国家、宗教团体等族群的认同问题时,往往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进行考察。相对于“潜谱牒学界”^①来说,他们从谱牒角度来研究族群认同问题的著述比例要大得多(当然不是绝对数多)。

2004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鉴于“9·11”之后美国国民开始反思此前忽视“美国国民身份”(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问题,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国内,出版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他在书中指出:“自从18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西方的重要特征……国民身份,如同其他的身份一样,是可建可拆、可升可降、可要可不要的。有的人对国民身份看得重,有的人却看得轻;同一个人心目中,国民身份占多大分量,也会随时间而有所改变。20世纪后期的历史充分证明,国家和民族国家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是可立可废的。与许多欧洲民族相比,美利坚民族更是一个脆弱的和历史不长的结构。”^{[221]90}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跨国公司的普遍出现,一些美国国民对于国民身份的认同已经被严重忽略,对此亨廷顿分析道:“所有的社会的存在都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威胁,并最终屈从于它们。但是也有一些社会尽管受到这样的威胁,却能够遏制和扭转衰落的过程,重新焕发出活力和特性,从而推迟其衰亡。”他进一步借用贝内迪克特·安德森所说:“国家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群体,更具体地说,是一种存在于记忆之中的群体,一种具有想象得到的历史的群体,由它的历史的记忆予以界定。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没有自己国家的历史的,这历史珍藏在国民的共同记忆之中,人们记得本国历史上的盛衰荣辱,它经历过的战争和敌人,它有过的英雄和坏人。”^{[221]98}由此亨廷顿认为:“美国人应当重新发扬盎格鲁一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因为正是它们三个半世纪以来为这里的各人种、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所接受,成为他们自由、团结、实力、繁荣以及作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义领导者的地位的源泉。”^[221]

这是亨廷顿为美国国民身份认同危机开出的“药方”,但由于美国的族群关系十分复杂,试图从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中唤醒“盎格鲁一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来消弭全体国民身份认同危机,当然能起到很大的“疗效”,但也未必能达到“痊愈”的效果。

我曾经与一位名叫安路的美国青年进行过交谈。安路是一位大学四年级的历史专业的学

^① 因为现在“潜谱牒学”还不是一门具备现代学科要素的显学,但已有一些人士在从事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所以只能用“潜谱牒学界”称之。

生,父亲是中美洲人,母亲祖籍中国广东。虽然他生长在美国,但是爱好中国传统文化,毕业论文准备写鉴真和尚到日本传播禅宗的论题。到中国进行短暂的学习期间,他走访了中国很多与传统文化有关的地方,并向一些书法人士学习写毛笔字。我问了关于他自身的身份认同问题,我说我们是中国人,其内涵除了我们的体质表征之外,有更多的文化元素在里面,比如传统武术、琴棋书画,这都是中国具有特质性的东西,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认识的呢?安路回答说,我们只能说自己是美国国籍,在美国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这种文化元素的,美国人来自很多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来源,美国具有开放的心态,美国人认同只能是在经济方面,认为自己的国家经济很发达,世界第一,因此产生了一种没有文化底蕴的骄傲自大。

王明珂也曾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的序论《什么是中国人?》中谈到海外“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中国人,无疑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除了居住在中国内地的十二亿多人外,在全世界还有数千万人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华人或中国人。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人?这问题不仅困扰着许多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甚至也困扰着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人。在美国,两代之间对于中国认同的差距,经常是华裔家庭的梦魇。许多年长的华人始终难以明白,为何他们的子女能否认自己是‘华人’。在东南亚,虽然常受挫于自己的华裔身份,许多家庭坚持华人认同已有数百年历史,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如此?”^[276]

不管是海外华人华侨华裔,还是中国内地的“中国人”,都存在身份认同的矛盾与变迁问题。在清末民初,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中国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进入自觉状态,但早期主要把“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后来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1920年11月4日,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上,孙中山在说明修改中国国民党总章及海外总支部章程的意义时说:“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我们中国许多的民族也只要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是完了。”^{[183]3707-3711}

然而要将“民族”(nation)这个外来概念引入中国语境中,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国情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国情是不同的,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概念的语境多是单一民族国家,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而按照近代沿用西方这一概念的认知,中国则存在着多个这样的单一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引入前苏联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运动,最后确定了中国由56个民族(nation)组成,同时又使用“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这一统称,然而当用这些概念与西方进行交流对话时,却出现了极大的逻辑混乱,因为“民族”(nation)与“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无法表明清晰的逻辑层次,中国的“民族”与西方的“nation”无法形成对译关系。对此,中国学者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性研究,然而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为此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试图建立一个解决“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之间逻辑矛盾的模式。此后一些学者又引用族群(ethnic group)理论,从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入手,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有人认为用“族群”这一偏重文化意义的概念来代替现在的56个“民族”概念,而用“中华民族”来指称中国境内的所有公民,这样就解决了二者的逻辑矛盾问题。

“民族”概念所引起的问题决不简单地仅存在于与西方交流对话的语境中，在中国内地内部也存在着一系列涉及身份认同的问题，如入籍中国的外国人怎么认同“中华民族”的身份呢？尤其是早在唐宋时期以来就居住在中国的外来民族呢？像犹太人从宋朝就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居住，他们应该算是中国 56 个民族中的哪个民族呢？1950 年之后的民族识别运动并没有完全将中国的“民族”种类识别完毕，也没有将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划分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所说的“56 个民族”其实只是一个近似准确的概念，其间必然存在着民族认同方面的差异。

正是存在着这些模糊地带，关于族群认同问题才有了更多的研究空间。学者们在研究民族认同的时候，主要是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进行考察，而这其中，也包含有不少的谱牒元素，如蒙古族、满族、畲族、瑶族等等少数民族中都含有丰富的祖先崇拜与宗族谱牒方面的素材，汉族更是不必多说了。

除了民族认同问题之外，宗族与移民问题本身就与谱牒有着伴生的关系，因此本文就选择了这三种族群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谱牒在这些族群认同活动中的角色问题。将我自己的亲身经验与谱牒(学)及族群认同问题进行综合观照，从而推演出研究谱牒与族群认同的可行性，这就是基本的选题背景。

从以上背景分析可以导出本文的理论意义：由于图书馆学、历史学、档案学界在研究谱牒问题时少有涉及族群认同范畴，本文的探索可以为这些学科在今后研究谱牒问题时拓展出一条新的思路；同时，虽然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界在做“民族志”(ethnography)等工作时，往往较多地征引谱牒资料，在研究民族认同时也有一些从谱牒角度出发的案例，但将谱牒与族群认同问题关联起来研究的论著非常少见，本文的探索是将这一关联进行强化，应该会给学界今后的研究提供一点有益的参考。另外，强调谱牒在民族国家认同中的价值，将为如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及海外华人圈的祖国认同感问题提供一点参考，这也将是本选题的实践意义所在。

1.2 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现状评述

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有世系、谱牒、族群、认同、民族、宗族、移民等，此处仅就“世系”和“族群”两个概念作一说明，关于“民族”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略有介绍，因不影响本文的主旨，就不进一步讨论了，而其他几个概念我与学界的看法并无不同之处，因此也没必要在本文予以特别介绍了。^①

世系(lineage)是指一个家族或宗族的血缘祖先传递系谱，对于人类来说，就像人能够记住自己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及儿孙辈一样，记忆世系或将它以某种方式传承下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人类活动现象。其实今天所说的谱牒的主体内容就是世系谱录，它占据谱牒之中绝对多数的篇幅，而诸如序跋、凡例、家规、家训、墓图、契约、恩荣、艺文一般都收录在卷首或卷末。由于在人类文明早期的时候，并没有今天所说的完整意义的谱牒，那时一般只是将祖先的谱系记录在甲

^①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谱牒”这一术语较多在学术界使用，与之相近的“宗谱”、“族谱”、“家谱”、“家乘”等名称并无明显的区别，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中选择使用而已。

骨金石上进行祭祀或者传承,甚至在文字没有出现的文明曙期或在没有文字的近现代族群中,祖先世系的记录与传承完全靠人类大脑的记忆与口传心授。由于本文讨论的对象中存在这样的祖先记忆情况,所以在谱牒之前加上世系这一并列术语。

族群(ethnic group)这一概念译法自1990年从中国台湾传入内地后,曾在国内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大范围的学术界人士参与了这场大讨论。而受到冲击最大的是“民族”概念,在大陆学者对“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矛盾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族群”概念的“闯入”无异于给学界注射了一针“兴奋剂”。这场讨论不仅涉及“ethnic group”的翻译问题,最主要的是就“族群”(ethnic group)与“民族”(nation)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马戎就在多篇著述中谈及要将“56个民族”改称“56个族群”,如他在《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可能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是从‘国族’的新角度来使用‘中华民族’这个习惯用语,同时保持56个‘民族’的称呼;第二个是‘中华民族’的称呼不变,以便与英文的‘nation’相对应,而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以与英文的‘ethnic groups’相对应,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有助于把在使用中相互模糊混淆的词汇明确相互区分开。”^[447]而潘蛟则从语源上研究了“ethnic group”及“nation”在西方语境当中的运用,认为“族群与民族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诉求和政治承认上。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拥有区域自治权利,因而不应该轻易把他们改称为族群。”^[451]郝时远则提示学界“存在对‘族群’概念理解片面和应用泛化的现象”。^[437]

尽管学界对“族群”(ethnic group)的认识及使用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一概念已经被广泛运用在诸多学科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研究“亚民族”群体及区域文化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如黄淑娉主持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1999)项目就运用族群理论对广东“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客家民系”等进行了一次人类学研究。

关于“ethnic group”的定义,在港台和大陆学术界中影响较大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961年的一篇名为*The Ethnic Group*文章中的一段描述:“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移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①[498]}

挪威人类学家Fredrik Barth在其*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一书的序言中谈到,族群这个名称在人类学著作中一般被理解为用以指这样一个群体:a)生物上具有极强自我延续性;b)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实现文化形式上的公开的统一;c)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d)具有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认可的成员资格,以形成一种与其他具有同一阶层(order)的不同种类。^②

① 该段文字原文章在诸多外文数据库中似乎都没有收录,也未看到内地学界公布,现从原文中辑出以便参照: Those human groups that entertain a subjective belief in their common descent — because of similarities of physical type or of customs or both, or because of memories of colonization and migration — in such a way that this belief is important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non-kindship communal relationship, we shall call “ethnic” groups, regardless of whether an objective blood relationship exists or not. (1961: 306)

② 原文: The term ethnic group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in anthropological literature(cf. e. g. Narroll 1964) to designate a population which: 1. is largely biologically self-perpetuating 2. shares fundamental cultural values, realized in overt unity in cultural forms 3. makes up a field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4. has a membership which identifies itself, and is identified by others, as constituting a category distinguishable from other categories of the same order. (1969:10-11)

从这两个关于“族群”认可度较高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这一概念强调的主要是偏于文化因素，韦伯强调“迁移中的共同记忆”及对“共同的世系”的主观信念，巴斯在强调群体的生物“自我延续性”外，还关注“共享基本的文化价值”及“组成交流和互动的领域”问题。这无疑与本文所要探讨的几个这样的群体有着很多的关联，鉴于此，本文即采取“族群”这一概念来总括“民族”（主要从文化层面理解）、“宗族”及“移民”这三种群体。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即文献综述。从本章前面的内容可以看出，关于“世系谱牒”及“族群认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文献是无法进行全面统计的，由于本文关心的是将两者关联起来研究的文献，因此就没有必要对它们分别予以介绍。而将“世系谱牒”与“族群认同”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著述则是屈指可数的，由于少得不具备统计学意义，所以本节就不用对它们进行分类条析了，以下仅将我所见到的国内外文献按序悉数开列述评。

在西方学者中，美国的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女士在研究满洲认同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The Tong in Two Worlds: Cultural Identity in Liaodong and Nurgan during the Thirteenth through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 (1983), *An Introduction to the Qing Foundation Myth* (1985), *Manzhou yuanliu kao and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Manchu Heritage* (1987),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1990), *The Manchus* (1997),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1999)等论文及专著是柯娇燕的系列代表作，她从满洲族源神话、满族姓氏及谱牒(乾隆时期的“世谱化”运动)等方面来讨论满洲(族)“种族”(race)意识的构建，这为满洲(族)研究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2005年，孙静在其博士论文《满族形成的再思考》中写道：“乾隆时期，满洲人通过追述其源流，编纂八旗满洲宗谱，依靠谱牒人为建立起族性发展的系谱，然后通过谱牒中反映出的血统关系，强化满汉之别和满洲人的族性意识。这个过程就是满洲人的‘世谱化’。‘世谱化’在满洲共同体内部催生了一种基于共同起源与历史经历的血统的力量。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八旗内的满洲人以及以满洲人为核心的旗人发生了诸多的变化，尽管‘满洲’的文化特征几乎丧失殆尽，但是，由于这种力量的存在，满洲与‘他者’的界限才能够始终维系与保持。可以说，‘世谱化’标志着一种稳定的、具有前现代民族性质的满洲主体认同意识的基本形成。”^{[508][101]}这无疑是受到了柯娇燕的启发，但孙静博士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证。

另外，定宜庄、胡鸿保两位学者的《从族谱编纂看满族的民族认同》一文分别从满族家谱所载“长白山起源”、“汉人随旗”及福建金朝女真宗室后裔粘氏家族凭借族谱从汉族改回满族的案例来讨论族谱在构建族群认同方面的意义。^[419]这两位作者还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就家谱和族群认同问题与〈福建族谱〉作者商榷》一文表达了不要在族谱的“虚构与真实”之间纠缠，而把目光投向“谱牒写作者的族群认同心理和历史意识”的观点。^[438]

在谱牒与民族认同问题方面的研究还有蓝炯熹《畬民家族文化》一书中关于畬族通过修改谱牒将盘瓠传说演绎为“河南传说”，将自己的族源追溯到中原华夏地区，从而实现身份认同的转变。^[123]赵海瑛《论盘瓠神话与畬族族群认同的中间环节》一文认为：“盘瓠神话和畬族族群认同之间，不只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还通过各种艺术延伸来沉淀心理认同，同时又经过各种仪式的形式

设计和内容编排的不断操演,使畚族群体对有关盘瓠神话的共同记忆进一步内化,进而把盘瓠神话和畚族族群认同整合成一个互相融通的体系。”^{[370]291—301}作者在文中提到的“祖图”这种“艺术延伸”就属于畚族的一种谱牒。

关于谱牒与宗族认同方面。林天蔚在《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一书中谈到谱系学问题时指出:“谱系学的新目标,不光是叙述祖先来源,慎终追远而已,主要是培养‘认同’的思想。”^{[165]137}

刘志伟在《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珠江三角洲一个宗族的个案分析》一文中分析沙湾何氏攀附南雄世系时认为,珠玑巷传说是岭南姓氏中普遍流传的祖先迁徙故事,沙湾何族附会编造祖先来历和定居沙湾的传说,可以作为社会身份的标志和权利的证明。因为要组成一个宗族,需要一个能被正统的文化传统所认同的历史,这是一个具有社会成员某种社会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证明和价值来源。沙湾何族的历史传说,不管真实与否,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群体记忆,是一个确认传统,昭示今日的“神话”。^[445]日本学者井上徹《中国的系谱与传说——以珠玑巷传说为线索》一文对于珠玑巷传说还有新的见地,他认为那些岭南土著之所以不敢承认土著的身份,主要是怕被排除在汉族系统之外,附会了珠玑巷传说就可以获得正统的汉人身份。^{[116]226—244}

以上两篇论文其实同时关涉到谱牒与移民(珠玑巷)认同问题。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一文从“知识考古学”及人类社会记忆历史的特性来研究“大槐树移民”对于祖先和家园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从而探寻这些话语和象征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他认为关于大槐树等故事的基本母题和主要情节作为传承历史记忆的符号,被族谱和口述传说这两种载体交替强化和传递着。^[492]

韩国学者吴一焕在《清代朝鲜明遗民寻宗访祖与修谱活动述论》一文中讨论了明末清初迁往朝鲜半岛的“明朝遗民”后裔在清代通过寻根问祖与修谱活动保持宗族认同与中华身份认同的问题。他认为:“遗民的群体文化意识表现在对故国亲族的怀念,他们有强烈的中华意识与祖先崇拜观念,不能忘却故国与自己祖先,希望通过族谱活动,保持宗人的认同与团结。这种认同,不只是家族血缘关系的认同,还有对中华文化的认同。”^[309]

以上就是我所见到的有关“世系谱牒与族群认同”问题的文章与书籍。^①如果要分析这些研究成果本身的不足,从而导出本论文“拾漏补缺”价值的话,我觉得他们都从不同方向做了有益的探索,并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地方,而真正的缺憾不是这些成果本身,应该是研究成果总体数量太少。我的这本书稿只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结合我自身的经验与思考进行的一次尝试性研究,希望广大“潜谱牒学界”的人士今后能进一步拓展谱牒学的研究视野,引入新的工具体系,不能仅限于传统的史料文献方法了。^②

① 当然还有一些论文或书籍中含有与本论题相近的片段,如满珂在《河南省蒙古族的生存现状与民族认同心理》一文中谈到家谱在河南省镇平县元朝官宦后裔确认蒙古族身份时起到的作用。^[497]但这些都不是作者自觉专论这一命题,因此本文就不做介绍了。

② 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漫谈谱牒与档案》一文中做了较为完整的表述。^[490]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本书主要综合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及历史文献考据法等。在运用社会文化人类学方法时,我并没有刻意模仿诸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功能主义或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等等这些学派的具体方法,在我还不知道“田野调查”、“民族志”为何物的时候,就曾在这方面有过不自觉的训练了,这可能与我15年前对诸如詹姆斯·G·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的《原始思维》等这些人类学学术经典爱不释手有关吧。田野调查的方法是我十几年以来一直乐于使用的手段,因为我十分明白很多材料是从文献中寻找不到的。而对于历史文献学的方法,是我国本土历史悠久的传统学术方法,像乾嘉学派的考据功夫是我惊叹不已的。然而,繁琐的考据过程往往给人一种望而却步的零碎感,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宏大叙事之法又必定是索然无味的,因此也有人提出了一种折中的“中层理论”之说。我不想和方法论的归属上做过多的纠缠,在本文中往往是多种方法交织在一起使用,在必要的时候我可能使用所谓“后现代解构主义”手法,对一些观点或者现象做出无情的肢解,因为我觉得对于那些“沉痾痼疾”如果不一剂“猛药”的话,起不到振聋发聩的效果;有时候又必须使用繁琐的文献考据之法来论证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还在适当的地方使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叙述之法,将一些过程像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在枯燥和激烈中增加一点感性的文字。另外,我也乐于接受王明珂关于“反思性研究”的建议^[466],少一些破坏性,多一点“仁慈心”。

关于本文的材料获取方法及途径。本章的第一节已经做了最简单的初步交代,因为这个工作我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涉及了。在早期的时候,对于文字材料,多用手抄的办法获取,若有可能则剪辑或复印,口碑资料则笔记或录音,书籍一般都是通过购买获取,那时候没有多少电子文献,所以获取的文献资料是相当有限的。2000年,我曾就此向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葛剑雄教授请益,得到了葛先生的指导与鼓励。^①

自从有了互联网及网络数据库之后,获取文献资料的途径和方法就更多了。“谱牒”、“家谱”、“族谱”、“宗谱”、“家乘”、“宗族”及“常建华”、“徐建华”、“陈建华”、“钱杭”、“谢维扬”、“冯尔康”、“王鹤鸣”等等这些都是我隔段时间就要检索一遍的关键词。常用的数据库有“中国知网”(www.cnki.net)、“读秀学术搜索”(www.duxiu.com)、“中美百万书库”(www.cadal.zju.edu.cn)等,“中国知网”中的学术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及报纸全文是利用较多的子库,“中美百万书库”的特色是收录了丰富的DJVU格式电子版古籍(原书扫描保真图片)，“读秀学术搜索”中所收PDG格式超星电子图书(原书扫描保真图片)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电子书库(也有一

^① 葛先生在信中说:“由于文化上的从众心理,广泛流传的口碑资料与历史事实已有相当大的差异。所以在历史研究中既要重视正史以外的资料,包括口头史料,但也要作认真分析,特别是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考察史料,才能有正确结论。你受过历史学的专门训练,再研究家族历史,应避免一般家谱的通病。”(2000年5月29日)